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2006年11月　　頁105~128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

黃　英　哲**

摘　要

目前，作為一門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漢學）」在國際學界已確立穩固的地位，相對於此，作為一門新興研究領域的「臺灣學」，在晚近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與臺灣的自我認識的「市民權」要求，才日漸受到臺灣內部與國際的重視。

相對於目前的榮景，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卻有一段長期被壓抑的時期，臺灣研究可以說一直到 60 年代時仍未受到重視，直至 70 年代才開始起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戰後 70 年代為止，臺灣研究在臺灣雖然受到壓抑但並未完全中斷，守住這絲研究命脈的有：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文化》（1946 年~50 年）、《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1948 年~55 年）及臺灣風物社（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臺灣風物》（1950 年~現在）這三個刊物及其作者群。然而，在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草創期間，持續臺灣研究的僅只有民間團體的「臺灣學」嗎？究竟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是如何展開？曾經被制度化成為一種官方支持的「臺灣學」嗎？而如果有的話，這樣的制度化的官方臺灣研究機構之濫觴為何？又是在何種歷史的機緣與脈絡之下登場的呢？

早在 80 年代，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即指出「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政府之臺灣研究機構的出發點」，筆者在談及臺灣省編譯館之相關研究論文中，也曾指出「臺灣省編譯館從成立到撤廢，期間極短，僅僅十個月，其唯一的成果是臺灣研究組在楊雲萍的領導下，整理、抄錄、編譯日本人留下的臺灣研究成果，（略）其貢獻是不容忽視與否定的，說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研究的出發點，想必是不為過。」本文旨在釐清作為戰後最初之官方的臺灣研究機構的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如何透過翻譯，以挪用為接收，繼承戰前日本學者在臺灣之臺灣研究成果，展開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角度探討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脈絡。

關鍵詞：戰後初期　臺灣研究　接收　翻譯　挪用

95.8.20 收稿，95.10.23 通過刊登。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及友人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偉智先生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意。

**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眾所周知，作爲一門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漢學）」在國際學界已確立穩固的地位，相對於此，作爲一門新興研究領域的「臺灣學」，在晚近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與臺灣的自我認識之市民權要求，才日漸受到臺灣內部與國際的重視。就臺灣外部來看，日本學界人士於1998年正式成立日本臺灣學會，即是一個證明，目前該學會的會員已經超過四百名，從事關於臺灣政治、歷史、社會、經濟、人類學、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相對於目前的榮景，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卻有一段長期被壓抑的時期，一般的看法是，一直到60年代時仍未受到重視，直至70年代才開始起步，[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戰後70年代爲止，臺灣研究在臺灣雖然受到壓抑但並未完全中斷，守住這絲研究命脈的有：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文化》（1946年~1950年）、《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1948年~1955年）及臺灣風物社（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臺灣風物》（1950年~現在）這三個刊物及其作者群。[2]然而，在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草創期間，持續臺灣研究的僅只有民間團體的「臺灣學」嗎？究竟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是如何展開？其曾經被制度化成爲一種官方支持的「臺灣學」嗎？而如果有的話，這樣的制度化的官方臺灣研究機構之濫觴爲何？又是在何種歷史的機緣與脈絡之下登場的呢？在「臺灣學」日漸成爲「顯學」的今天，上述的問題必須作一徹底的釐清，藉以開展更爲健全的臺灣研究。

早在80年代，若林正丈即指出「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政府之臺灣研究機構的出發點」[3]，筆者在談及臺灣省編譯館之相關研究論文中，也曾指出「臺灣省編譯館從成立到撤廢，期間極短，僅僅十個月，其唯一的成果是臺灣研究組在楊雲萍的領導下，整理、抄錄、編譯日本人留下的臺灣研究成果，（略）其貢獻是不容忽視與否定的，說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是戰後臺灣研究的出發點，想必是不爲過。」[4]本文旨在釐清作爲戰後最初之官方的臺灣研究機構的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以及以其爲核心的戰後初期臺灣之

[1] 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 年），頁 88。

[2] 同前註，頁 45-88。若林正丈〈(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Ⅱ解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4 號（東京：綠蔭書房，1982 年），頁 58。

[3] 前揭若林正丈，〈(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Ⅱ解題〉，頁 108。

[4] 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 年），頁 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研究的展開，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角度探討戰後臺灣之臺灣研究的脈絡。

二、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之設立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接收臺灣。在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後，當時臺灣人已經相當日本化。臺灣知名作家葉石濤（1925~）回憶戰爭結束時，他甚至連臺灣話（閩南話）也不會說，因而斷言當時臺灣有三分之二人口已經日本化了。[5]著名的人類學家，前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戰後初期仍留在改組後的臺灣大學任教的金關丈夫也感懷當時臺灣大學臺灣學生的心情是「他們已經體認到自己和日本文化是切割不斷的。雖然誰也沒講開，卻可以感覺得出他們甚至已經把日本當作自己的故鄉。」[6]上述也許只是葉石濤和金關丈夫個人的主觀感受，但是卻相當真實的呈現了日本敗戰前後，在經歷過了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之後，臺灣在社會文化上的變化，而這些殖民變遷的現象，在戰後國府接收臺灣之後，被問題化與標籤化爲臺灣人的「奴化」問題。[7]

因此，對國府而言，接收臺灣後當務之急的課題是如何儘速使臺灣和臺灣人「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1945年10月，國府派陳儀接收臺灣，任命陳儀爲戰後臺灣統治機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抵臺後，立即展開「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文化重建政策，而臺灣省編譯館即是執行其文化重建政策的機構之一。[8]臺灣省編譯館底下設有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和臺灣研究組。其中，學校教材組的任務是編纂適合臺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師範教育的學生中文程度之教科書，以此來推展中國語文教育，並透過其教育內容灌輸臺灣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社會讀物組的任務則是編輯大眾讀物《光復文庫》，藉由《光復文庫》的普及來推廣中國語文，此外，藉著《光復文庫》之文化內容，進行中國文化的移植工作。名著編譯組的任務則是翻譯世界名著、名作。其目的是希望透過閱讀這些

[5]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第 29 卷第 4 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1 年 12 月），頁 158。

[6] 金關丈夫，《孤燈の夢》（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 年），頁 297。

[7] 詳細請參考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臺灣人「奴化」了嗎？〉《「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 年）。

[8] 關於陳儀之臺灣文化重建政策等及其機構，詳見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東京：創土社，1999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著、名作的中文譯本，擴展大學生及研究者的視野，激發其研究心。臺灣研究組的任務在於整理、翻譯並接收繼承日本學者所遺留下來的臺灣研究成果。[9]

前面曾指出戰後國府的臺灣文化重建政策是本著兩條基本路線，即要將臺灣「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針對此，臺灣省編譯館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的任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臺灣研究組的任務在於整理、翻譯、接收日本學者所遺留下來的臺灣研究，換言之，即接收日本的學術文化，這與「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政策間有何交集呢？

關於臺灣省編譯館的設立，陳儀聘請有同鄉之誼，且自1902年同時赴日留學以來一直保持深厚交情的好友許壽裳來臺主持，而陳儀與魯迅、許壽裳的深厚情誼眾所周知。臺灣省編譯館在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成立後的第三天8月10日，館長許壽裳在記者會上，針對編譯館的主要工作作了以下說明：

> 本館設立的要旨不外兩點：第一、促進臺胞的心理建設，臺灣教育，向稱普及，一般同胞大抵至少受過六年或八年的教育，這種情形在各省是少見的。可是臺胞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的機會，所以我們對於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本館的使命，就要供應這種需要的讀物。
>
> 第二、對於全國有協進文化、示範研究的責任。臺灣的學術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以有為各省模範的資格。（略）過去本省在日本統治下的軍閥侵略主義，當然應該根絕，可是純粹學術性的研究，卻也不能抹殺其價值，我們應該接收下來，加以發揚光大。如果把過去數十年間日本專門學者從事臺灣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譯和整理，編成一套臺灣研究叢書，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
>
> 根據上述這兩項旨趣，本館的工作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臺灣研究四組。前兩組是實現第一項旨趣的，後兩組是實現第二項旨趣。1、學校教材組，為供應各級學校之教材。2、社會讀物組，編撰主旨則於國民發展。（略）3、名著編譯組，（略）就本省環境說此組，最初之工作，應特別注重（一）民主教養讀物。（二）民生教養讀物。（三）科學技術修養讀物。（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史實。（五）最近將來國際情勢之演變等。4、臺灣研究組，現在吾等之計畫則（一）臺灣文獻目錄編纂。（二）善本書之

[9] 詳細請參考前揭拙著〈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印行。（三）搜集並刊印日本專家之名作。（四）調查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加以整理研究。（五）刊行臺灣學報發表研究作品等。[10]

值得注意的是，許壽裳在記者會上的公開發言中並未否定日本所遺留下的學術文化，同年9月15日，在一場對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學員的講話「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中，他更進一步公開表示：

> 臺灣在文化上至少有兩種特點，這是各省所沒有，同時也可為各省作模範的：
>
> 一、有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略）臺灣農業發達，教育普及，工業也有基礎，民生主義容易實現。實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良好基礎。這是臺灣文化的第一點特色。
>
> 二、是豐富的學術研究：（略）臺灣有研究學術的風氣，可以說是日人的示範作用，也可說是日人的功績。日本雖然是侵略國家，但他們的學術我們需要保留，需要全國學者繼續研究，把它發揚光大，作為我們建國之用。日人對臺灣的研究很多，他們的著作也很豐富。已經出版的不說，原稿已寫好未出版的還不少，因為不久有一部分日本學者將遣送回國，希望能拿出來，我們把它翻譯校訂付印貢獻給社會，還有材料已找好，但尚未寫出的，也希望能寫出來。他們對臺灣的研究如：地形、植物、氣象、礦產以及人文各科等等都有分門別類的研究，很有成績，如植物一門，就有三十多種書籍，關於動物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過去發生「鼠疫」即有跳蚤、老鼠等研究專書出版。這不但是我國各省所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很少有。這種寶貴的材料，我們不能不注意而忽略。而且要好好保持，繼續發展。這是我國學術的光彩，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也是臺灣文化的第二點特色。[11]

從許壽裳的談話可知，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目的，即是爲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加以整理編譯，使其成爲此後發展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有用材料。換言之，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其中文化與資料化的以挪用爲接收之構想，這與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政策中的以再造爲接收之「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理念並不相悖。許壽裳

[10]《民報》（臺北：1946 年 8 月 11 日），第二版。

[11]許壽裳，〈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臺灣省訓練團團刊》2 卷 4 期（臺灣省訓練團，1946 年 10 月），頁 244-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抵臺後（1946年6月25日），即積極的處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究成果，其7月11日的日記即記下「晚至現代週刊談，與達夫（陳兼善，時任臺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博物館館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剛，時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圖書館館長）及廷英（馬廷英，時任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兼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談臺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12]7月24日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康，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臺灣關係誌料小解》。」[13]戰後初期，來臺從事接收工作的中國官僚，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如陳儀、許壽裳、長官公署處長范壽康、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等人大都是具有日本留學經驗的「知日派」，在從事接收工作與臺灣文化重建時，也將日本的學術文化之接收納入視野。長官公署在接收臺灣後，1945年11月3日，隨即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徵用日本技術人員與學術研究人員。[14]此日本學術研究人員的徵用，可以說是爲了方便接收日本的學術文化而採行的政策。

關於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意義，在留用日人這方，也有清楚的認知。曾被臺灣省編譯館徵用，在臺灣研究組工作的著名臺灣史前史、考古學者國分直一，1949年返回日本後，隔年春，即在《東洋史研究》發表〈戰後臺灣之史學民族學界〉一文，文中指出「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設立，有其應當給予注目的意義，它是以日本文化的接收和強化翻譯陣容爲目標，意圖某種程度完成日本時代未竟的研究，將其成果提供予學界。」[15]國分同時又指出，中國接收臺灣後設立的臺灣省編譯館，其業務不僅僅是如日本時代文教局編譯課，所行教育關係讀物之編輯工作，還有以廣大民眾之教化爲目的，編譯、翻譯介紹外國名著，其中尤以臺灣研究爲其主要工作，規模是相當大的。[16]

---

[12] 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ー，1993 年），頁 224。

[13] 同前註，頁 225。

[14] 詳細請參考湯熙勇，〈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臺籍、羅致外省籍及徵用日人（1945.10-194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 卷 1 期（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1 年）。

[15] 國分直一，〈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界―主として中国内地学の動きについて―〉，同氏著《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文社，1981 年），頁 4。

[16] 同前註，頁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成員

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一職，許壽裳任命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楊雲萍擔任。[17]楊雲萍曾經在國府接收臺灣的前夕10月14日、15日、16日，一連三天在當時的報紙《民報》上，發表〈文獻的接收〉一文，大聲疾呼：

>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到藏金銀玉帛的地方，分之。唯有蕭何一人，不顧金銀玉帛，只收了秦的圖書藏之。後來，沛公得知道天下的厄塞，戶口的多少強弱之處和人民疾苦的事情，皆因為有得了這圖書的緣故。此次臺灣的接收，對於一切的物資、器材、建築、設備等等，當然要詳加注意。可是對於圖書、檔案等文獻，更當要有十二分的考慮。（中略）
>
> 臺灣文獻的收藏，最多、最豐富的，不消說，要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府縣志類的蒐藏不只是臺灣關係而已，關係福建、廣東兩省的也頗有可觀。如周氏之《重修臺灣府志》（影抄本）、范氏之《重修臺灣府志》（原刊本），以及《臺灣通志》（原稿本）等。（中略）此外，關於臺灣的文獻，如《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原刊殿版）、施琅《靖海紀》（原刊本）、黃叔璥《臺海史槎錄》（原刊本）、水野遵《征番私記》（原稿本）、歐文《被閑卻（遺忘）的臺灣》（1675 年）等，有的堪稱稀覯祕籍。可是此館所藏中、日、歐文的臺灣文獻之價值，卻不是在於某一部，或某一冊的稀本，而是在於蒐集的豐富和有系統。假使要研究我臺灣的歷史和文化，絕對不能無視此館的特藏，我們才能研究我臺省的歷史和文化。不，說因有此館的特藏我們才能研究我臺省的歷史和文化也不為過勁。（中略）

[17] 楊雲萍（1906-2000），出身台北士林的富裕家庭，1921 年入學臺北第一中學校，在學中創刊文學同人誌《人人》，之後前往東京留學，1928 年從日本大學文科預科畢業，1931 年畢業於文化學院大學部文學部創作科，在文化學院期間他受教於名小說家、評論家菊池寬、小林秀雄、川端康成等人。返臺後，活躍於臺灣文化界，發表多篇與臺灣文學、歷史相關的文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臺灣總督府有密切關係的南方協會的「南方資料館」所藏的文獻也很值得注目。尤其是前年臺總督府支出日金五十萬所購得的「羅斯文庫」是關於海南島的最豐富、最完備的特藏。（中略）

其次要說到臺北帝國大學的藏書了，（中略）臺北帝國大學的藏書，大別可分為大學附屬圖書館之收藏與各研究室之所藏。附屬圖書館在收藏普通圖書之外，有收藏各種的特藏。例如福州龔氏烏石山房的舊藏，故久保天隨博士蒐集之中國戲曲書類（稱為久保文庫）。（中略）關於西歐的舊版本，即有「大鳥文庫」（政治家大鳥圭介、大鳥富士太郎父子的舊藏書）的燦然存在。（中略）日本的國學、文學關係，即有長澤伴雄及其他的舊藏，不克一一在此枚舉。只是對於臺灣關係的「伊能文庫」和「井出文庫」不可不略為敘述。

「伊能文庫」為《臺灣文化誌》的著者故伊能嘉矩氏所收集舊藏的。（中略）「井出文庫」乃井出季和太所收集的文獻。他曾奉職於臺灣總督府，從事調查情報、圖書檢閱諸事務。所以他因職務上，得以收集當時臺灣與中國關係的刊行物。日本的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是我們臺灣種種社會運動盛興時期，被禁止被處分的刊行物是無量數。「井出文庫」所收藏的就是這些被處分被禁止的刊行物。（中略）

假使筆者的小文，對臺灣的文獻之接收得喚起些少的參考，那就再萬幸沒有了。筆者相信我們的當局，當有特別的考慮，同時我希望現在保管著這些文獻的日方當事者理解文獻是萬人共有的文化財，對我國的接收誠意，坦率地盡了他們的責任。[18]

從楊雲萍的文章中，也能夠清楚理解在日本敗戰的時間點上，臺灣關係資料的收藏是多麼豐富，不管殖民當局當初的收集動機爲何，這些收集卻成了日後臺灣研究的重要資料。

楊雲萍在戰爭結束初期的呼籲，終於還是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同年10月25日，國府正式接收臺灣，長官公署隔年即聘請楊雲萍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作爲接收日本留下之文物圖書的諮詢顧問。長官公署在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同時也留用前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爲圖書館重建委員，

[18] 楊雲萍，〈文獻的接收〉(上、中、下)《民報》（臺北：1945 年 10 月 14 日、15 日、1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協助接收工作與重新開館工作，隔年又將楊雲萍呼籲重視的「南方資料館」併入，成立「臺灣省圖書館」（48年，改名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73年，改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而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時，也留用了星野弘四、森澤巖、佐藤経等多名原圖書館員[19]，協助圖書的接收與整理。

從許壽裳日記可具體得知許壽裳是在7月9日與洪炎秋見面[20]，7月25日，同洪炎秋（臺灣出身，時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連震東（臺灣出身，時任臺灣省參議會秘書長）一起和楊雲萍會面[21]，楊雲萍隨後即擔任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在稍後的回憶中，也提到了接任的經過：

> 臺灣光復，游彌堅先生（時任臺北市長）設立臺灣文化協進會，創刊《臺灣文化》月刊，《內外要聞》旬刊，由我主編。協進會辦公的地方，在市中山堂三樓。有一天，洪炎秋先生突然來訪，說許壽裳季茀先生要和我見面，（略）我們一見如舊，（略）他詳細說明編譯館的目的，規模以及人員的待遇。（略）他說在北京時，已經看過我的中日文著作。要我參加編譯館，看到我的名片，知道我是長官公署參議，又說可以兼任。對於他老先生的熱情和誠懇，我立即答應。[22]

楊雲萍在戰前即活躍於藝文界，且發表多篇關於臺灣文史的文章，享有文名。日本戰敗後，在國府接收臺灣之際，他公開呼籲國府應重視日本遺留之臺灣文獻，並予以妥當接收，此舉受到長官公署的重視，因而任命他爲長官公署參議。之後經洪炎秋、連震東引薦給許壽裳，許壽裳任命他爲臺灣研究組主任，是可以理解的。

臺灣研究組的具體工作內容是什麼呢？根據「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畫」，臺灣研究組的工作計畫列出如下：

1、編印臺灣文獻目錄。

2、編行臺灣研究叢書，內容分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民俗、宗教、農業、工業、動物、植物、氣象、地質、醫學各項。

3、翻印臺灣昔時文獻。

---

[19] 台灣協會所藏《臺灣引揚・留用紀錄》第 8 卷（東京：ゆまり書房複刻，1998 年），頁 275。

[20] 前揭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頁 223。

[21] 同前註。頁 225.。

[22]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 卷 4 期（臺北：中外雜誌社，1981 年 10 月），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臺灣先史時代遺跡之發掘與研究。

5、臺灣民俗研究。

6、臺灣高山族語言研究。

7、出版臺灣學報。

8、編著臺灣地理。

9、編著臺灣史。

10、調查本省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

11、編行臺灣經濟年鑑。

12、其他。[23]

從上述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看來，臺灣研究資料的調查復刻之外，其研究範圍更包括了今天所謂的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學門，可以說是跨領域的「臺灣研究」，是全方位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臺灣學」研究。臺灣研究組自成立以後，立即積極展開工作，而其具體的工作內容，當時的報紙也都予以報導，例如1946年9月7日，《人民導報》報導臺灣省編譯館計畫將臺灣省圖書館中所藏之《臺灣通志》稿本加以校訂後出版之消息。[24]1946年12月6日，《民報》報導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祖赴新竹縣苑裡及後龍底兩處挖掘先史遺跡的消息。[25]

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可說非常繁多，理想目標也很崇高。其成員主要由哪些人組成呢？根據1946年12月長官公署編印的《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其中所列的人員有編纂楊雲萍、鄭桓、淺井惠倫，編審梁嘉彬、張常惺、國分直一，幹事池田敏雄、廉新生、張樑標、賴子清。[26]從上述名單中，可得知臺灣研究組一開始從其他機關爭取的留用日本人員有國分直一、池田敏雄和淺井惠倫。此外，「二二八事件」後，大部分的留用日本人員多被遣送回國，在被遣送前夕，根據《臺灣引揚・留用紀錄》中所收入的文件〈日僑留用實況調查報告　臺灣省編譯館員日僑一同36

[23] 見「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畫」，許壽裳家屬提供。

[24] 詳見〈編譯館校印台灣通志〉《人民導報》（臺北：1946年9月7日）。

[25] 詳見〈挖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民報》（臺北：1946年12月6日）。

[26]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台北：長官公署，1946年），頁108-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7）・3・31〉，列出當時臺灣研究組任用之留用日本人名單及工作職稱，名單上除了國分直一、池田敏雄、淺井惠倫之外，還有編纂素木得一、編審樋口末廣、編輯立石鐵臣、助理幹事竹下萬吉、竹下律子、助理員片瀨弘。

這些留用人員戰前的專長與其在臺灣研究組所擔任的工作，如下：南洋言語及臺灣原住民語專家，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擔任人文科學方面之研究工作，特別是平埔族的語言研究。考古學、臺灣史前史專家，前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擔任臺灣史前史的研究，發掘採取臺灣史前時代的遺跡。臺灣的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擔任臺灣本地人的民俗資料和舊慣資料的分類整理。另外，臺灣的昆蟲專家，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素木得一，擔任熱帶、亞熱帶資源及昆蟲相關文獻目錄之編纂和自然科學方面之研究工作。標本製作版畫家立石鐵臣，擔任史前時代資料的圖版製作與裝訂編輯，前南方資料館司書（圖書管理員）樋口末廣擔任世界各處刊行中的臺灣關係文獻之綜合目錄的編纂。此外，又從臺灣省圖書館調來該館留用之日籍人員竹下萬吉、竹下律子，擔任素木得一的助理。[27]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所任用之留用日本人，除了學者專家外，也有圖書館專門人才，楊雲萍的意圖相當明確，他認爲日本人遺留下來的研究成果固然要接收，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圖書文獻資料更要接收。

關於臺灣研究組的留用日本人人事，有部分人選是由楊雲萍推薦的，據其回憶：

> 編譯館留用三位日人，都由我推薦，而由許館長決定的。一位是臺北帝國大學的淺井惠倫教授。他是語言學者，多年來研究臺灣和南洋原住民的語言。一位是國分直一先生，研究臺灣先史學。一位是立石鐵臣先生，畫家。這些日人的「專門」，相當「特殊」，可是壽裳先生都決定留用[28]

從楊雲萍的證言可以得知臺灣研究組的日本人成員，至少有三位是由楊雲萍推薦的。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研究組的主任楊雲萍及日本人成員中的國分直一、淺井惠倫、池田敏雄、立石鐵臣都是戰前《民俗臺灣》雜誌的同仁，在戰爭末期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之際，臺灣的抗日運動又遭壓制，加上臺灣人的言論機關幾乎全被收編的情形下，臺灣知識份子依附在一批較能理解臺灣的日本學者、文化人之下，以日本人名義發行《民俗臺灣》，研究、紀錄臺灣的風俗習慣。戰後這批日本學者、文化人在國府推行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政策下，加上擔任館長的許壽裳對於日本學術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以及楊雲萍的號召、規

[27] 前揭《臺灣引揚・留用紀錄》第九卷，頁 78-94。

[28] 前揭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頁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劃，因而集合了這批對臺灣有充分研究的日人學者將之納入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由中、臺、日三地有識之士、學者共同爲整理保存戰前的臺灣研究而努力[29]。某種戰前戰後臺灣研究的人的與知識生產的連續性，也在這個過渡期中呈現。

四、臺灣省編譯館的廢止與臺灣研究組的成果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事件後，4月22日，國府行政院會決定將長官公署裁廢，改組爲省政府，並更換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改派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對此，日後國分直一也感嘆：陳儀的去職與魏道明的就任，意味著「歐美派」官僚與學者將要取代活躍於戰後初期臺灣的「知日派」官僚與學者。[30]同年5月11日，陳儀離臺，5月15日，魏道明抵臺履新。隔日，召開省政府委員會第一回政務會議，決議撤廢編譯館，其業務由省政府教育廳接管，[31]編譯館自成立以後，僅十個月即被撤廢。許壽裳在編譯館被撤廢的翌日5月17日於日記記下：

>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日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於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32]

編譯館撤廢的原因省政府並無明確說明，當時編譯館的名著編譯組編審李何林，在日後曾指出編譯館的即刻廢止之決定，係魏道明從南京帶來的國民黨CC派之指令，因爲許壽裳經常反對CC派主導的法西斯教育政策。[33]臺灣省編譯館的設立，於法的層面來說，是陳儀利用行政長官的立法權，制定臺灣省單行法規，因而在制度上是相當脆弱的，當陳儀被更換時，編譯館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更何況當長官公署撤廢改組爲省政府時，臺灣行政機構也全面進行再調整，編譯館的撤廢有可能也只是整個新設省政府行政機構調整的一環。

---

[29] 詳細請參考松永正義，〈《許壽裳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通信》34 号（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4 年 3 月）。收於氏著『台湾文学のおもしろさ』（東京：研文出版，2006 年）

[30] 前揭國分直一〈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界―主として中国内地学の動きについて―〉，頁 9。

[31]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台灣省政府秘書處，1947 年 5 月 17 日），頁 16。

[32] 前揭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頁 250。

[33] 李何林，《李何林選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 年），頁 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7年6月24日，臺灣省編譯館改組爲編審委員會，由教育廳接管，當時負責移交的編譯館編纂章微穎，曾證言：

> 移交中，除已印成圖書二十餘種外，計有稿件三百餘萬言，皆編譯初成或尚未完成。[34]

隔日6月25日，館長許壽裳在日記上寫下：

> 來臺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35]

臺灣省編譯館撤廢後，館長許壽裳受聘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許壽裳推薦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臺灣研究組的留用日本人員，除了國分直一與立石鐵臣到1949年爲止，被臺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繼續留用外，其餘皆遣送回日。臺灣省編譯館從設立（1946年8月7日）到撤廢（1947年5月16日），爲期不到一年，其主要的成果是刊行二十餘種的圖書，與三百萬餘字未完成的稿件，此成果也含括了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究竟臺灣研究組的具體成果爲何？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夕的1月18日，臺灣省編譯館編的工作概況中，關於臺灣研究組的研究概況列有：

1、臺灣研究組編譯鈔校書目

書名	內容	編譯者	字數	完成時期
琉球亡國實錄	原書名琉球見聞錄，一名廢藩事件係琉球舊藩士喜舍場朝賢所著於琉球滅亡史實記載甚詳	梁嘉彬	三萬	三十六年一月
過去日人在臺灣之科學活動	就生物，醫學，農學，工	張常惺	五萬	三十五年十二月

[34] 章微穎，〈36 年（1947 年）6 年臺灣省編譯館結束，賦短章呈翁師座〉，許壽裳家屬提供。

[35] 前揭北岡正子、黃英哲、秦賢次編，《許壽裳日記》，頁 2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成績	礦，地質，各部門敘述過去日人在臺之著作發明及建設。			
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	臺灣全志向無索引此以便稽放	賴子清	四萬	已完成
瘧疾特論	瘧疾在臺灣醫界十分重要本書係臺大醫學院教授森下薰所著立論精闢原文約九萬字	廉新三	九萬	
臺灣昆蟲誌	以世界所產昆蟲約四十萬之分類爲基礎關於各目各科的特徵對於臺灣產的昆蟲每屬記一種藉以說明全體	素木得一		
高山族語言集成	上篇平埔蕃語①SUiraya祭歌②校訂荷蘭Utrecht大學所藏新港語字典稿本③已告死滅之平埔蕃語殘存資料④Kabaran語語彙及語法⑤Pazeh語語彙	淺井惠倫 孫建中		上篇三十六年三月 下篇三十六年十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語法 下篇高山蕃語①各方言之語法②比較語言學的研究			
臺灣先史時代之研究	實地調查臺灣先史時代之遺跡採集資料研究其文化及考究其系統	國分直一	十五萬	三十六年十月
臺北盆地之農家		國分直一 張樑標		
臺灣民俗研究	福建系臺灣人的個人生活上的諸種儀式分產育，成年，婚姻，葬禮四部	池田敏雄 張樑標		
臺灣通志	原書爲清蔣師徹，薛紹元等編纂都四十卷值臺省淪陷尙未完成原稿藏省圖書館由本館借抄一遍並加校勘及標點符號			
小琉球漫誌	原書爲清朱仕玠（筠園）著凡十卷記本省風物詩文俱佳存者極少本館由臺大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借鈔已加標校			
使署聞情	原書爲清六十七（居魯）所輯計四卷搜集本省藝文甚眾多爲方志所未載經本館向楊氏習靜齋借鈔			

2、臺灣學報第一期篇目

書名	內容	編譯者	字數	完成時期
臺灣書志考	爲臺省經籍考之一部仿朱氏經義考謝氏晚明史籍考之例於本省典籍目錄加以考證以爲臺灣研究之助	楊雲萍	三萬	三十五年十二月
明末旅日華僑甲必丹李旦與鄭芝龍	原書係臺大教授岩生成一之論文對於近世初期臺灣史之貢獻極大	岩生成一 鄭桓	三萬	三十五年十二月
射人		金關丈夫 張樑標		
後龍底及苑裡先史遺跡發掘預報		國分直一		
通論澳門琉球在歷史上條約上的地位		梁嘉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先史時代鞋形石器攷		國分直一 張樑標		
鼠族驅逐論		青木文一郎 張樑標		
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		池田敏雄 張樑標		
體育之起源演進及今後趨勢		謝似顏		
Utrecht大學所藏臺灣平埔蕃語彙		淺井惠倫 孫建中[36]		

從以上列表可以清楚了解當時臺灣研究組的具體工作內容，除了挖掘先史遺跡、編譯鈔校臺灣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外，還準備出版學術刊物《臺灣學報》。編譯者中不乏傑出學者，其中淺井惠倫爲前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言語學講座教授，岩生成一爲南洋史教授，金關丈夫爲醫學部解剖學教授，素木得一爲昆蟲學、養蠶學講座教授，並與青木文一郎先後擔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長。張樑標爲臺北帝大史學科畢業文學士，爲日治時代史學科出身臺籍二人之一（另一爲柯設偕）。前面也指出了臺灣研究組甚至還計畫編行「臺灣研究叢書」，館長許壽裳連〈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也已寫就。關於計畫中編行的「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他寫道：

> 建設事業經緯萬端，而首重振興學術。臺灣在最近五十年間，日本專家孜孜探究成績可觀。今幸光復，為紀念計，宜求已完成之稿妥為翻譯，公之于世，尤冀吾國學者續事研求，益臻完善，故有臺灣研究叢書之刊行，既以奠科學研究之基，亦以廣全國建設之用。[37]

由許壽裳親自撰寫的〈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內容可以得知，臺灣研究組之所以能有豐碩的具體工作成果，實應歸功身爲館長的許壽裳對日本學者的臺灣研究之正面肯定。1947年6月24日，臺灣省編譯館改組爲編審委員會，由教育廳正式接管，8月，楊雲萍對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親自作了總結與呼籲。

[36] 〈臺灣省編譯館工作概況 民國 36 年 1 月 18 日編〉，許壽裳家屬提供，收於《民國三十六年台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 年），頁 k89-k91。

[37] 許壽裳，〈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許壽裳家屬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省編譯館已報撤銷，此乃當局的方針，曾在館裡服務的我個人；雖有些感慨，可是，不想說什麼，何況「撤後是非誰管得」！

只將我直接關係的臺灣研究的一些成就的一部分（除素木博士的論文，先前已送寄臺灣大學，餘皆移交教育廳的。）列舉於下，一用以紀念諸同仁的心血，一用以供對臺灣的文化和歷史有關懷的人士的參考。

△「隋代琉球確非臺灣考」梁嘉彬著

△「明末旅日甲必丹李旦與鄭芝龍」岩生成一著，鄭桓譯

△「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國分直一著，張樑標譯

△「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同著，同譯

△「臺北盆地之農家」同著

△「鼠族驅除考」青木文一郎著，張樑標譯

△「射人」W,Eberhard 原著　金關丈夫譯註

△「福建系臺灣人的產育習俗」池田敏夫（雄）著 張樑標譯

△「Utrecht 大學所藏臺灣平埔語彙」（淺）井惠倫著 孫建中譯

△「瘧疾特論」森下薰著　廉新生譯

△「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賴子清編

△「臺灣昆蟲相」素木得一著

△「臺灣氣象」鄭桓編譯

△「過去日人在臺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張常惺著

△「臺灣文治，武備沿革史略」 金溟若著

△「石器圖譜」立石鐵臣畫

上列的，除一二篇外，餘皆完成的，有的是達數十萬言的巨著。日籍人員除岩生，森下，金關，青木四博士外，餘皆是館內的人員；就是岩生博士等的著作，也皆是未發表過的新稿。此外還有「臺灣通志」，「小琉球漫志」，「使署閒情」等的傳抄和校勘及「臺灣關係文獻目錄」的編輯。

編譯館之成立期間不及十個月，而實際工作的時間，除籌備的時間，和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只有五六個月而已。--可是，一切已是過去了，又何所用其眷念哉！只希望教育廳當局，對於上列的著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發表和刊行，有了誠意的考慮。（僅將此小節，呈給陳公洽，許季莆兩先生。）[38]

楊雲萍親自對臺灣研究組所作的總結，除了能夠理解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外，也能夠側面理解日本人留下的臺灣研究成果有多少。楊雲萍呼籲省政府教育廳對臺灣研究組的工作成果要有「誠意的考慮」，似乎也有影響。隔年1948年6月，省政府成立臺灣省通志館繼續臺灣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39]楊雲萍擔任了該館顧問委員會委員，其後，49年6月，臺灣省通志館又改組爲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楊雲萍擔任了委員。此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爲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一個在大學之外，官方的文獻編輯業務、學者、業餘的民間文化人士的集結點，在戰後數十年間，以在國府的歷史意識「中國史化」之下的「地方史」型態存在著。2002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又改名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在制度上依然是上述的隱形延續。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研究及編譯成果，在編譯館解散後，部分曾發表在當時由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的《臺灣文化》與稍後的《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上。此外，臺灣研究組的留用日本學者如淺井惠倫、池田敏雄也將當時的成果帶回日本，日後在日本學術刊物上發表。

五、結論

戰前，帝國日本在亞洲，包括殖民地臺灣的調查研究活動，按其目的與屬性可大致分爲六類。1、文獻調查・資料收集。2、物產・軍事要地調查。3、舊慣・習俗調查（包含民族調查）。4、市場・經濟情形調查。5、經濟計畫立案調查。6、華僑・華人調查。[40]因爲有上述的調查活動，當日本戰敗時，已累積相當龐大數量的研究成果。[41]

[38]楊雲萍，〈近世雜記(六)〉，《臺灣文化》2 卷 5 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 年 8 月），頁 12。

[39]台灣省通志館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工作內容與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有許多重疊處，詳細請參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40]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同氏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 6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頁 4。

[41]關於戰前日本在台灣的學術研究成果，人類學研究部分請參考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1884—1952）》（東京：勁草書房，2005 年），頁 227-293。史學研究部分請參考吳密察〈殖民地大学とその戦後〉，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5年10月，國府派陳儀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臺灣文化重建政策。包括陳儀在內，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時代在臺灣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大陸來臺官員、學者，以「知日派」佔多數，因而較能理解日本遺留的臺灣研究之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當時，擔任臺灣文化重建機構之一的臺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也大聲疾呼對於日本所遺留下具有學術性的研究應該接收，並將之編譯成中文，意圖作知識的再生產，使其成爲中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換言之，將日人的學術文化研究「中國化」的挪用策略，這正也符合「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臺灣文化重建方針。爲此，許壽裳在臺灣省編譯館設臺灣研究組，並任命臺灣出身，活躍於戰前及戰後初期對臺灣文、史方面頗有研究的楊雲萍擔任研究組主任。

臺灣研究組主要工作是接收，甚至也可說是繼承戰前日本人留下的臺灣調查文獻資料與臺灣研究，將其「中國化」，與現今臺灣的臺灣研究之努力「去中國化」大相逕庭。在楊雲萍的推薦下，臺灣研究組所任用的一批留用日本學者，正可擔任最佳輔佐角色。從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成果看來，除了做史前史跡發掘，也進行田野調查、文獻資料鈔錄、復刻、編譯，其研究範圍囊括今天所稱的「臺灣學」、「臺灣研究」，它同時也是戰後臺灣，作爲政府機構的臺灣研究——「臺灣學」之出發點。臺灣研究組主要成員的楊雲萍、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皆是戰前《民俗臺灣》的同仁，同時也是至70年代爲止維繫戰後臺灣研究命脈的重要民間刊物《臺灣文化》、《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臺灣風物》的重要執筆者。

臺灣省編譯館徹廢後，臺灣研究組的主要工作內容由臺灣省通志館繼承，50年代以後，國分直一在臺北師範學校時代的學生王世慶，任職於臺灣省通志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繼承師學爲臺灣文獻的保存研究貢獻良多。至於臺灣研究組的日本工作人員，除了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在1949年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外，其餘則在1947年遣返日本，1949年，國分、立石及臺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另一留用日本學者宮本延人返國後，其研究工作則由臺灣出身的陳紹馨、陳奇祿、宋文薰繼承。而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則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擔任南明史與臺灣史的教學，至1977年退休爲止。從戰前到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在知識生產上，在制度的與人員的方面，就是以這種微妙的方式，在斷裂中的繼承與展開。

（責任校對：楊雅儒）

《記憶する台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 年），頁 293-339。醫學研究及農業研究部分，請參考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臺灣師大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年），頁 246-3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臺灣引揚・留用紀錄》臺灣協會所藏，第8卷，東京：ゆまり書房複刻，1998年。

「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畫」，許壽裳家屬提供。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長官公署，1946年。

〈臺灣省編譯館工作概況 民國36年1月18日編〉，許壽裳家屬提供，收於《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年鑑》，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頁k89-k9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1884-1952）》，東京：勁草書房，2005年，頁227-293。

李何林，《李何林選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52。

金關丈夫，《孤燈の夢》，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年。

陳怡真，《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年

黃英哲，《台湾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東京：創土社，1999年。

黃英哲、北岡正子、秦賢次合編，《許壽裳日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3月。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臺灣師大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年，頁246-355。

二、報刊雜誌

〈編譯館校印 臺灣通志〉，《人民導報》，臺北，1946年9月7日。

〈挖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臺北，1946年12月6日。

《民報》，臺北，1946年8月11日，第二版。

《臺灣省政府公報》，臺北：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47年5月17日，頁16。

三、論文

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同氏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密察，〈殖民地大学とその戦後〉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若林正丈，〈（池田敏雄）敗戰日記Ⅰ Ⅱ解題〉，《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4號，東京：綠蔭書房，1982年。

國分直一，〈戰後台湾における史学民族学界—主として中国内地学者の動きについて—〉同氏著《台湾考古民族誌》，東京：慶文社，1981年。

許壽裳，〈臺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臺灣省訓練團團刊》2卷4期，臺灣省訓練團，1946年10月。

許壽裳，〈發印臺灣研究叢書之緣起及辦法〉，許壽裳家屬提供。

松永正義，〈《許壽裳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学文献センター通信》34号，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4年3月。

章微穎，〈36年（1947年）6年 臺灣省編譯館結束，賦短章呈翁師座〉，許壽裳家屬提供。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爲例〉，《思與言》第29卷第4期，臺北：思與言雜誌社，1991年12月。

湯熙勇，〈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臺籍、羅致外省籍及徵用日人（1945.10-194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卷1期，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1年。

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年。

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臺灣人「奴化」了嗎？〉《「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年。

楊雲萍，〈近世雜記（六）〉，《臺灣文化》2卷5期，臺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年8月，頁12。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卷4期，臺北：中外雜誌社，1981年10月。

楊雲萍，〈文獻的接收〉（上、中、下）《民報》，臺北：1945年10月14日、15日、16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Studies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Taiwan: Continuation within Historical Disruption

Huang, Ying-che*

Abstract

Chinese Studies （Hanxue） has a well-established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ld as a legitimate field of research. Taiwan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prompted by the recent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desire for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self-identify as Taiwanese, is gradually gaining attention internationally.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Studies was suppressed and even in the 1960s did not receive the attention it was due. It was not until 1970s that Taiwan Studies began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even during that immediate postwar era, Taiwanese studies never completely disappeared. There were three publications—*Taiwanese Culture* （*Taiwan wenhua*, Taiwanese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1945-50）, the literary section *Taiwan Fengtu* （1948-55）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News （Gonglunbao, 1950-present）, and *Taiwan Fengwu* （1950-present） published by Taiwan Fengwushe （Lin Benyuan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Foundation）—whose writers kept the endangered field alive. However, were these private groups the only resource for Taiwan Studies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ostwar era? How did postwar Taiwan Studies develope as a field? Was it ever institutionalized as an officially-recognized discipline? If so, what was the genesis of that official apparatus? Under wha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did it come about?

As early as the 1980s Japanese scholar Wakabayashi Masatake pointed to the Taiwan Research Team at the Taiwan Provincial Editorial and Translation Bureau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ostwar government-backed Taiwan Studies organizations.” In my own article discussing the Taiwan Provincial Editorial and Translation Bureau, I propose that “though TPETB only existed for a short ten months from commencement to its abolishment, we shall neither ignore nor negat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scholarship of the Japanese, which was consolidated, transcribed, and edited and transl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ang Yunping. It is not too farfetched to say that TPETB is the foundation for postwar Taiwan Stud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first official postwar institute TPETB inherited and appropriated the fruit of pre-war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 Profess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 Aichi University Jap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iwan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postwar Taiwa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Keywords: immediate postwar era, Taiwanese Studies, take over, translation, appropri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